

创意阅读

中国文学名家新评

聂震宁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创意阅读

中国文学名家新评



聂震宁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意阅读：中国文学名家新评/聂震宁主编.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1

ISBN 978-7-5329-2922-1

I. 创… II. 聂… III. 文学家—人物研究—中国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22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68×245 毫米 16 开
印张/26 插页/3 千字/299
印 数 1—5000
定 价 29.00 元

PREFACE

序 言

聂震宁

《创意阅读——中国文学名家新评》这本书实在算不上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评论文集。收入集中的许多文章就文体而言并不是一回事,更无论风格和所秉持的文学主义。我是如此地喜欢铁凝所写的《怀念孙犁先生》。“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白居易),感事、动情与作家的为人、为文链接起来,使得评赏抵达人性的深度。然而,这篇实在算不上是评论的文字,犹豫再三,我们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作家新评,谁也没有规定过评赏作家的文章应当如何写就。真正喜爱文学的人都会本能地吸收这样的评赏文字而不会主动要求受文学批评写作窠臼的限制。我也佩服叶兆言、梁衡、王充闾、卞毓方的文化散文式的作家评赏文章。这些文化散文着实意象俱足、宛然在目,表现了作家主观情思与客观境遇天然合一的境界。这样的文章与其说是品评,不如说是品赏,因其更接近于散文写法。但讨论再三,我们还是把这一类美文介绍给原本要到书中阅读评论文章的读者诸君。有意有象,有情有景,多义性和歧义性,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无限性和有限性,这是文学的本来面貌,似有若无的东西恰恰是文学的最大魅力所在,窃以为用文化散文这种写法也许更能贴近作家,帮助读者阅读。

当然,评论文章,说到底还是本书的主体,没有它们本书就无理由称作“作家新评”。然而,文无定法,评论文章当然也不会拘于一法。王蒙之评赏李商隐,简直就是是一次阅读与创作的畅想。“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李贽),且“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以这样的解诗观来赏评李商隐和他的诗,实在是最贴近的一种方法。曹文轩之关于鲁迅的评论文字则以情理见功力。宣讲鲁迅,不感之以情无法扬其善,不识之以理无法颂其真,曹文轩于大学圣殿之上的布道当可直入人心。孙郁的文章本书选得最多,乃是因为我们被孙文深厚悠长的文化意味和温婉蕴藉的文字所打动。他的文章总是博而有物。他清醒,然而意味深长;他热情,然而有骨有态。总之,本书所选评论文章,有学理,有分析,有创见,篇篇意迁妙想、言作慧解。吴晓东论废名、重庆炳论王蒙、李陀论汪曾祺、李静论王安忆、郗元宝论张炜,等等,有的深入,有的标新,有的深入而标新,读来路转峰回、动人心魄。特别是李静评论王安忆,我们难得读到如此这般既

与人为善更以文为本的态度诚恳的评论。在我国当代作家里,王安忆卓然独立。她视野广阔,富有深度,艺术自变力强,成就非凡。评论家尊重作家的文学成就,那是对文学现实的一种尊重,但并不意味着就此止于思考。评论往往要从他的成就与缺憾、文本的得与失开始,揭示每一位作家都必然具有的写作维度与困境,进而探讨文学所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对此李静做得坚定不移,做得推心置腹,殊为难得,使得我们的阅读具有强烈的紧张感和张力。这篇文章是“1996年5月初稿,1999年修改,2001年3月以《失名的漫游者》为题发表,2002年10月据王安忆近年新作最后改定”,足见评论家的执著和认真,也足见一位优秀作家那持续而强大的吸引力。

编选此书,我们对所选文章,或论理,或论事,或叙事,或抒情,坚持不拘一格,无不以本文优秀是取。诚如宋代秦少游论文所言:“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所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虽然文学流派不同,本原均须不失雅正,却也不必扬李抑杜,归为一尊。读者诸君自然也是要分别文体,分别意趣,分别主张和创意去阅读才是。

《创意阅读》最初计划是编选中、外文学共两种书评集,后书业反响有热度,专家有好评,兼之评书之外尚有评人之文亟待与读者共享,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中、外作家新评两种。四种书出齐,我们与读者朋友们的创意阅读之旅也就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我首先要真诚地感谢读者朋友们,在书多如过江之鲫而市场反应又五花八门的当下,诸君竟能青睐一套文学评论集,能一本又一本地接受它们,可见当今经济社会还能容得下很多张平静的书桌。我也要诚挚地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应该社邀约,本人忝作这套书的主编,实际工作却主要是责任编辑所承担,他们一再感谢我应承了此项工作,我却要一再感谢他们承担了此项实务,还要感谢出版社决心出版这样一套未必能够雅俗共赏的专业读物。一般来说,就内容而言,出版工作分为创新性出版和积累性出版两大类,大体上创新性选题易好,积累性选题难工。这套书于创新、积累兼而有之,于积累中见创新,足见他们的卓越见识和追求。我更要感谢入选这套书的作者方家们。书的真正主体是他们。正是由于他们卓具创意的写作,才给读者和出版者带来无限创意的导引,带来了这历时近两年的创意阅读之旅。在今天这个创意的时代,当代文学评论的写作渐成创意之风,这使得评论文字不仅附丽于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具有自己可供独立欣赏的美学价值,这是当代文学的光荣,也是阅读社会的幸事,让我们向我们文学评论的作者们致敬。

2008年12月26日于北京

CONTENTS

目 录

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 / 鲍鹏山	1
两个李白 / 王充闾	12
烂醉是生涯 ——杜甫的新形象 / 柏桦	21
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 / 王蒙	32
苏东坡的世界 / 王水照	48
乱世中的美神 / 梁衡	59
把栏杆拍遍 / 梁衡	75
西天无性别 ——吴承恩 / 匡文立	83
苦行僧蒲松龄 / 马瑞芳	93
邂逅曹雪芹 / 洪烛	103
“细瘦的洋烛”及其他 ——读鲁迅 / 曹文轩	112

沧桑诗魂 / 卞毓方	129
身后的寂寞 / 孙 郁	142
郁达夫册页 / 车前子	149
朱自清 / 叶兆言	160
激情的归途 / 许纪霖	165
废名的乡土记忆 / 吴晓东	175
出走与归来 / 祝 勇	191
他给了我们什么 / 孙 郁	209
儒墨何妨共一堂 / 刘绪源	214
谁看秋月春风 / 李 锐	225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 孙 郁	232
女性的天空 ——重读萧红 / 凌云岚	246

怀念孙犁先生 / 铁 凝	261
道不自器 與之圓方 / 李 陀	268
沉香缭绕众生相 / 止 庵	280
生命的本真 / 孙 郁	297
正才之风 / 周泽雄	307
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 / 童庆炳	315
智者戏谑 ——阅读王小波 / 戴锦华	327
不冒险的旅程 ——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 / 李 静	343
走在技术时代相反的方向上 ——张炜论 / 郅元宝	370
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 / 王德威	386
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 ——关于铁凝小说的话语伦理 / 谢有顺	395

鲍鹏山

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

屈原是一本大书，可以让我们代代翻阅而不能尽其义；或者如胡适所说，是一个大“箭垛”，我们人人都可以向他那里射上心中所想；或者，如我曾经比喻的，是一个大大的“滚雪球”，当他向时光的坡道上滚过一代又一代时，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附着上自己的东西：既是对屈原的新发现，也是价值的增值。是的，物质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 278 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却永在生长，且日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庇荫着、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若从其具体主张上讲，实际上并不见得有多高明，这话定会让很多人恼火，但我恳求他们让我诚实地说出我的看法。《离骚》的诉说有三个对象：对君，对自己，对小人。简单地说，对君是忠，标志着对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对士之弃天下如弃敝屣的自由否定，也标志着另一种观念的建立：“忠”。这与荀子是一致的，荀子比较起孔、孟，特别强调这个“忠”。

忠而见疑，便是怨。这怨之来处就是“忠”。由忠而见疑产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妇之道”的，是颇为自卑而没出息的。更糟糕的是，《离骚》还把自己的受委屈、被疏远、被流放归罪于“小人”对自己光彩的遮蔽，对自己清白的污染。这“小人”很像是第三者，插足在自己与君

王之间，导致自己的被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弃妇心态，就是从屈原开始的。

对外在权威的皈依和依附，导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没落。屈原的选择标志着路只剩下一条：在绝对君权下放弃自己的主体选择，除了获得一个特定的君主的认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几乎是一条绝路。贾谊、晁错式的悲剧早已在屈原那里发生，难怪贾谊独独心有戚戚于屈原。

好在《离骚》中还有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与赞扬，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带来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这可能是因为先秦士人主体精神的强大基础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撑。令人稍感吃惊的是，正是在屈原这样一位向君权表忠的人那里，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精神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约还没有人能 and 屈原相比：他那么强调自己、坚持自己、赞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据此认为《离骚》非屈原所作——他们的根据是：一个人怎能这样夸奖自己），而且一再表明，为了坚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体解不怨。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屈原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们大力宣扬屈原忠君爱国爱民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他张扬个性的一面。这后一点，也许是屈原最可贵的东西。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碾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的个性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中国古代，优美的抒情作品实在太多了，但像《离骚》这样华丽的交响乐则太少。单从篇幅上讲，它就是空前绝后的，全篇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几千年来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纪录。而其结构的繁复、主题的丰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叹为观

止。作为抒情诗，能展开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叹服屈原本人的思想和个性精神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形式上的特点，正是由于他自设情节，使得一首抒情诗才能像叙事诗那样逐层打开，逐层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处，游历到精神之原的开阔地带。抒情诗而有了“情节”，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隐喻的，所以，象征和隐喻也是《离骚》的主要艺术手法，比起《诗经》的比兴，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统性设喻，与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设情节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不管怎么说，屈原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第一位”，盖因他之前尚无称得上伟大的诗人，甚至连“诗人”也不易觅得。《诗经》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几位还颇有几首诗保存在这被称之为“经”的集子中，但我总觉得，《诗经》之伟大，乃是整体之伟大，如果拆散开来，就每一首诗而言，可以说它们精致、艺术、有个性，但绝说不上“伟大”。“伟大的诗人”须有伟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润后人；须有绝大的艺术创造，可以标新立异，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超越。应该说，在这两点上，屈原都当之无愧。就前一点而言，屈原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虽然对他的精神价值，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时我们理解为“忠君”，有时我们理解为“忠民”，有时我们又理解为“爱国”，总之，他已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诱导之一。就后一点来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人生绝境中的数量不多的艺术创造，已胜过楚国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几百年创下的世俗政权的勋业。他寄托在他诗歌创造中的志向与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刘安和司马迁的共同评价。我们知道，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艺术创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超经越义，自铸伟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是中国历史上

最杰出的文论家刘勰对他的评价。一个史界的司马迁，一个文论界的刘勰，两个在各自领域中顶尖的人物，对他的精神与艺术、人格与风格，做这样至高无上的推崇，屈原之影响人心、之折服人心，于斯可见。

其实，屈原作品的数量并不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数目为二十五篇，刘向的已散佚的《楚辞》及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列出了这二十五篇的篇名，它们是：《离骚》一，《九歌》十一，《天问》一，《九章》九，《远游》、《卜居》、《渔父》各一。一篇被梁启超称为“全部楚辞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颇为遗憾。近世有不少学者力主此作为屈原的作品，我虽拙于考据，但从情感上说，我很希望这篇作品的著作权归于屈原。多年以前，我支边去青海，一待十七年之久，常起故乡之思（我本楚人）。每吟那“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的《招魂》，尤其是那结尾三句，即不胜感慨之至：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我们知道这“哀江南”，后来被那羁留北方的江南人庾信敷衍成一赋《哀江南赋》，其赋其序，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除此之外，即便在二十五篇之列的《远游》《卜居》《渔父》，也有不少人否认为屈原作品。作为学术研究，他们说什么自有他们的根据，但要让我来做这样的判断，我则没有心情——我不大喜欢他们的“根据”，因为那“根据”本身即不算稳固，我还是依我的“心情”，这三篇，仍为屈原作品。你看这样的句子多么好：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远游》）

这是何等的寂寞！一个人好像突坠一个深黑无底的宇宙黑洞，扪天叩地，寂无回音。近千年后，幽州台上的陈子昂，还在唱这样的调子。再看这样的句子：

谁可与玩斯遗芳兮？长向风而舒情。

（《远游》）

谁？！谁与我一同赏玩芳草？！我只长向清风舒展情怀！这样的句子，除了屈原，除了这个被命运的风雨拨弄得死去又活来的人儿，谁能写得出？

《卜居》乃屈原卜自己以何居世，这样的大问题，似乎也只有屈原才发问。屈原向太卜郑詹尹一口气问了十八个涉及人格、人品、人生策略与人生道德原则的大问题，把郑詹尹问得哑口无言。是的，这样深刻的问题，谁能回答得出？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如果说，《卜居》是写公共生活中人以何种面目面世，那么，《渔父》则是写在私人生活中，人如何背转身来，面对自己。渔父给出了一种随波逐流、与世推移的人生策略，但屈原则不能忍心于以自身的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这确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的伦理责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们自身的逍遥。但在屈原身上，我们却也看到了，正是这种伦理责任压力，使得屈原精神之流的压强增大，使他的人格不断向上，使他臻

于伟大之境。

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可以分成三类：《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一类，是屈原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记录，是他公共生活形象的写真，是他的心灵史、受难史、流浪史，是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见证。《九歌》十一篇为第二类，这是一组深情绵绵的情爱类作品，取之于楚国巫风中的娱神歌曲，屈原把它们改造了，变成了他自己的独创，因为他把自己那一往情深的心灵寄托在了里面。第三类只有一篇：《天问》。这是一篇独特的作品：不仅在屈原作品中是独特的，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独特的、怪异的，又是令人震惊的。全诗一千五百多字，三百七十多句，诘问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关键还不是这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而是这种疑问的精神与勇气。这种精神与勇气实际上是人类精神的象征。人类精神总是通过人类最杰出的分子——人之子，来做最集中的体现。

在他的第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痛：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饨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这是《离骚》中的句子，充斥着“恐”、“太息”、“哀”、“怨”、“饨”（烦闷）……骚者，哭也！为时光哭，为生命短暂哭，为短暂的生

命里不尽的痛苦、失意哭。注意，他诗中的“民”，也就是“人”，“民生”即“人生”，“民心”即“人心”。他开始从“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表达愤怒，提出诉求。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愤怒，往往是道德愤怒，是集体的愤怒；而屈原的愤怒，虽然也有道德的支撑，但却是个人的愤怒。屈原很执著地向我们诉说他受到的具体的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楚怀王如何背叛了他，顷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兰与靳尚如何谗毁他……他起诉的是这些人对他个人的伤害与不公。他指责他们的不道德，指责他们没有责任心，指责他们道德上与智力上的双重昏聩，但这都出自他很自我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诗中读出了人生的感慨，读出了人的命运，读出了一个不愿屈服的个人所感受到的人生困窘，一个保持个性独立意志的个体在集体中受到的压迫甚至迫害。如果说，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经》，其人生感受的尖锐性大有挫折而略显迟钝的话，那么，怒形于色，被班固批评为“露才扬己”的屈原，则以其“发愤以抒情”（《惜诵》），“自怨生”（司马迁）的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当个性在面对不公与伤害时，是何等的锋利而深入。这种锋利，一方面当然是对社会的切割，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内心的血淋淋的开剥。伟大的个性，就从这血泊中挺身立起。

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离骚》）

我们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看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诗人；看到了一个时时在掩面痛哭的诗人；看到了一个面向风雨“发愤以抒情”，又对人间的邪恶不停地诅咒的诗人；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泽

畔，长歌当哭，以泪作诗的诗人。可他并不脆弱，并不告饶，并不退却——不，决不。他已从人群中上前一步，成为孤独而傲慢的个体，与全体对立，他决不再退却：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

《诗经》的俗世精神很了不起，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个人的意义，消解了个性与社会的对立，从而阻碍了个性的张扬。它入世的深度恰恰减少了个性的深度。而屈原，由于他已被主流社会抛弃——他的被流放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而他的《远游》，则正是他精神的自我流放——他有深刻的孤独。在以不堪一击的个体面对命运时，个性在绝望中显示了它的高度、深度与完美。

刘勰说楚辞是“气往轶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鲁迅说楚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并且较之《诗经》，说它“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屈原是被人群抛弃的，有人会说抛弃他的只是楚怀王、顷襄王父子，但从对体制高度认同的屈原来讲，被这一对父子抛弃，就足以使他有“国无人莫我知兮”（一国中没人知道我）的孤独感。假如屈原是一个脆弱的人，或者说，他的个性还不够坚定，他可能会试图改变自己，再回到人群中去，但偏偏他是一个倔犟而不肯一丝迁就的人，纯洁而不受一丝污浊的人，一个九死无悔的人，于是，便出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对峙：一边是世俗的强大权力及权力控御下的人群及其思想，一边是孤独无依却一意孤行决不屈服的个人。屈原的伟大，即体现在这种对峙之中。他的失败，就因为他取对立的

立场而不曾屈服，他的成功与辉煌，他的光荣与梦想，也是因为他取对立的立场而不肯屈服。所以，我曾在《屈原：无路可走》一文中说：“屈原之影响后世，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的作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与社会、文化发生冲突，并遭到毁灭的记录，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所以，如果我们说，《诗经》是北方世俗生活的记录，它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因此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名目，那么《离骚》，则是一个苦难心灵的记录。《诗经》反映的是生活中的冲突，《离骚》则由生活中的冲突深入到内心的冲突。“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班固）。是的，“离骚”乃是一个强悍不屈的个性心灵的痛苦心声。它体现了个性的深度、痛苦可以达到的深度，它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坚持，自我的抗争，是追求自由、幸福与个人信仰的曙光。

所以，我说，屈原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几乎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个性的深处掘进，决不浅尝辄止，决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就往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决不回头，直至决绝而去，一死了之。他对邪恶，怨而至于怒了，他对自己，哀而至于伤了。他的文学形式，较之《诗经》的节制，他的篇幅与情感，真的是“淫”（过分）了。所以，我曾说，《诗经》中任一首诗，单列出来，都略显渺小，它们靠的是群体的分量而占有文学上的一席之地。而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天问》、《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杰出的篇目，是可以单独地自立于诗歌之林，单独地成为一道风景，称得起“大诗”的。即如他的《九歌》，写苦写痛，写爱写痴，写恋写愁，写盼写思，无一不往情深，叫人有惊心动魄之感：